香港地位由經濟決定 張德江指路破解困局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參加香港代表團審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批評，香港有人將經濟、民生問題當成政治問題炒作，將所有問題泛政治化，更走向街頭暴力，搞亂香港。謀發展依然是當前首務，唯有推動香港不斷發展，方能為市民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為市民提供更完善的福利和保障，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張德江言之諄諄，為香港社會指明路向，值得「智商很高的港人」重視。

王國強

張德江在講話中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有新情況發生。經濟增長放緩，傳統優勢弱化，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緩慢，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及其對社會發展的瓶頸效應，亟待破解，但不應該將這些問題政治化，特別是少數激進分子，蓄意製造暴亂，對香港的安寧穩定帶來極大的破壞。張德江的講話，顯示中央對於香港的情況了如指掌。概括而言，香港近年出現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根源正是發展速度減慢、傳統優勢弱化所造成的。

張德江一針見血點出香港困局癥結

大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暴亂，固然是一小撮「激進分離勢力」所策動觸發。然而，一場大規模的暴亂不可能沒有社會根源，也並非一小撮激進分子可以策動出來。因此，對於旺角暴亂應該有兩手工作，一是要將暴徒繩之以法，並處以具阻嚇力的懲罰，以重振法治權威，恢復社會秩序。近年激進分子的違法衝擊愈益變本加厲，一個主要原因是犯事者不用承擔應有懲罰。政治若可以作為辯護的藉口，只會不斷損害法治尊嚴。因此，香港必須全力維護法治，對於衝擊法治底線的行為，絕不能姑息。

二是必須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上暴亂的土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2014年的「佔中」以及大年初一的旺角暴亂絕不是憑空而至，當中確實暴露了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反映了一些市民的怨氣。當中主要原因是香港發展陷入瓶頸。有外國學者的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不均，如果使對立的意識形態形成，最終使社會因分化而撕裂。香港社會近年的對立某程度也是由經濟民生問題所引發及激化的。社會發展停滯，導致向上流動減慢，年輕一代看到居高不下的樓價更是看不到出路，因而不斷滋生怨氣，並且將對於現狀的種種不滿轉移到政府身上，將所有問題政治化，成為了激進勢力發展的土壤。近年香港出現了一個新形勢，就是一些本來只屬經濟民生的議題，都極容易衍生成政治爭議甚至是激烈衝突，當中根源正是由於社會出現各種深層次矛盾，令市民不滿不斷積累，就如一個吹脹了的氣球，輕輕一刺就會爆破。

抓緊國家機遇 謀發展解矛盾

張德江在講話中苦口婆心地再三提示香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不應再蹉跎歲月、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香港的地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全世界看中的是香港的經濟、自由港、背靠中國內地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經濟環境、法治環境，而不是搞「街頭政治」。因此，必須把謀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張德江言之諄諄，好言相勸，希望香港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顯示中央領導人對香港的關切和期望。同時，這也指出了香港突破當前政治困局的出路：就是要充分抓緊國家的機遇，包括「十三五」規劃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千載難逢機遇，搭乘國家的快車，從而為香港培育新的經濟引擎。只有令香港經濟重新振作，社會流動加快，各種深層次矛盾才有望得到紓緩，這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香港的地位是由經濟決定，而不是街頭政治。沒有經濟發展，不但市民利益難有保障，香港也將失去所有的價值，變成一個「平庸城市」。而一個「平庸城市」是沒有將來也沒有出路的。相信廣大市民都不希望看到香港衰落。現在擺在香港面前的，是發展和衰退的臨界點，中央已經為香港指明路向，香港市民應該齊心一意謀發展，造福廣大市民，不要錯失歷史的機遇。

政府應將「廣東計劃」擴展至福建省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區議員

青年議政

2010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附設新的「廣東計劃」，讓選擇移居廣東並符合資格的長者在當地領取高齡津貼（生果金），金額與本地高齡津貼相同。申請人獲批准後，無須每年返港，亦可以領取高齡津貼。已於2013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東計劃」，讓居於廣東省的長者豁免留港60日限制，得以申領生果金，大大方便長期居住在內地的長者。而我們收到不少福建籍長者訴求，希望「廣東計劃」擴展至福建省，讓移居福建省的長者同樣受惠。

現時香港有很多福建籍的長者由於各種原因，例如在港沒有居所、方便親人照顧等等要長居內地。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1年初進行的調查，約46,000名年滿65歲的香港居民，是在廣東省居住。而年滿65歲而於福建省居住的香港居民，則有大約16,000人。故現時長居內地的長者也有相當比例的人數居住在福建省。

香港房屋狹窄，要求領取高齡津貼長者回港居住60日，對家人造成不便，極容易造成家庭糾紛。其次，福建省地理位置十分接近香港，已有大型運輸系統（例如高鐵）連接。加上落實「福建計劃」更可進一步減輕本港醫療的負擔。綜合而言，福建省條件與廣東省十分相似，應該可以實施「福建計劃」。

因此，我們促請政府盡快展開研究，將「廣東計劃」的覆蓋範圍擴展至福建省及其他內地省份，讓選擇移居內地並符合資格的香港長者在當地領取津貼。長遠目標，特區政府也應將「長者生活津貼(即每月$2,390元)」納入範圍內，讓所有在內地居住的長者都得到一致的福利對待。

適當量刑是法治的基礎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在刑事法律中，當被告經審訊被判定有罪後，下一步就是由主審法官按控罪事實的嚴重性作出量刑(Sentencing)，香港的刑事法例都會列明罪行的最高刑罰，法官不會每罪都判最高刑罰，而是會按具體的案情及其嚴重性作出量刑，那是法官的酌情權，而這就是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所謂「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罪刑相稱」。當然，法官在衡量被告刑罰時不會只是簡單的看罪行的嚴重性，還要按被告實際的參與程度(是主謀還是從犯)，他以前有沒犯過同類罪行，是否有預謀、有計劃，有否主觀惡意，以及罪行對社會的危害性等等因素作出通盤考慮。

違法「佔領」行動後，對相關違法人士的檢控工作相當緩慢，就算有人被檢控帶上法院，刑罰也相對出奇地輕微，鮮有被判監的，根本沒有阻嚇作用，大眾的觀感是法院量刑好像出了什麼問題，法院傾向輕判違法「佔中」者，法治得不到彰顯。最終的惡果是爆發年初一晚的旺角暴亂。

正當大家為香港法治憂心之餘，有一宗高院上訴案件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前年「佔領」行動期間發生的激烈衝擊立法會案件，三名被告承認刑事毀壞（最高入獄十年)及非法集結(最高入獄三年)兩罪，最初裁判官只判三名被告社會服務令，公眾嘩然，律政司也認為刑期過輕而向裁判官申請覆核刑期，在看過當晚事件錄影後，裁判官改判他們三人入獄三個半月，三名被告不服向高等法院上訴，早前高等法院法官駁回三名被告的上訴，指三人當時的行為性質屬於暴亂，市民雖有言論及集會自由，但必須守法、守秩序和絕不能使用暴力破壞公物，此舉也有可能傷及其他在場人士，性質嚴重，這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雖然三人均屬初犯，但是次罪行情節嚴重，必須判監以收阻嚇之用。

這件案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此案為高院上訴案件，高院（上級法院）在這上訴案中確認了裁判法院(初級法院)的判刑覆核，按普通法原則，其判決對所有下級法院均具約束力，成為案例。因此，以後裁判法院對這等暴力衝擊行為，必須要依從此案例判處監禁刑罰，這似乎是香港法治的一個小勝利。

大家可以看到，量刑是刑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法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量刑失去懲罰和阻嚇的作用，便沒有人再會去守法了！到時非法「佔領」甚至暴亂將會無日無之，若是如此，法治將會崩潰，這決非香港之福。

幫幫孩子

桂 松

近期的自殺爆發率之高、輕生者之多，殊為罕見，社會為之震驚！教育局連忙召開緊急會議，隨即作出五項應對辦法，足見政府對此的高度重視和迅速反應。希望全社會(尤其是教育界和家長)都予以關注，視之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問題，共同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而努力。

青少年教育本來就不是輕而易舉之事。社會越發展，青少年碰到的問題因前所未有而更複雜，教育工作的難度也就更大。作為青少年長輩的教師和家長，對此應有充分的認識，切忌沿用簡單化的處理手法。

在物質豐裕的年代，青少年受貧窮的苦痛少於其前代，其抗逆能力亦因而減弱；但精神壓力卻不減反增。社會日趨功利化以及競爭的白熱化，使青少年深受困擾。學業壓力之重，前所未有，要求他們「贏在起跑線上」，不就是「千鈞壓」嗎？有些家長因而成為「怪獸家長」也不在乎。哪裡知道在青少年幼嫩的心靈中平添了多少煩惱！只因出於望子成龍的願望，卻忽視了子女的需要和承受力，因而不斷地「催谷」、「催谷」，久而久之，就會引起質變，可怕的事也就會出現。過分看重學業成績，過分緊張去爭逐名校，無疑是造成青少年沉重壓力的元兇。

我們關心青少年，切勿僅僅從教師和家長的主觀期望和要求出發，這會忽視了青少年自身的選擇、喜好和能力，這種主觀願望越強，則越脫離青少年的客觀實際。若能多些從青少年角度上看，為他們多想一想，也許更贏得他們的支持，彼此的心也就容易連在一起，溝通的渠道暢通，什麼事情都好辦。

我們這個時代，物質文明發展迅猛，精神文明似乎有點滯後。現代資訊科技的創新產品層出不窮，伴隨而來的副作用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離。青少年受到手機、電腦、電台、電視等的吸引，容易着迷，他們與長輩或同伴的接觸便會減少。由於他們的心智未成熟，遇上逆境，若得不到及時的援助，可能因想不開而幹出傻事。事實證明，單靠「網絡世界」並不能使青少年擺脫窘境，物化不能代替人性化。只有加強人與人的接觸，促進相互的了解和交流，才能真正解決那些心靈上的問題。這對於青少年，尤為重要。

無可否認，目前師生關係以及家長與子女關係都比過去淡薄，這是一種危機。教師工作負擔過重，缺乏接觸學生的時間和空間；而學校課程又較為繁重，使師生均受更大的壓力。家長由於種種障礙，接觸子女的機會不多，對子女的內心世界不甚了了，往往到了嚴重關頭才恍然大悟，可惜已經太遲。

由此可見，切實做好青少年的教育工作，需要着眼於增加與青少年的接觸，這有賴於政府和整個社會的合作。政府的教育政策應酌量調整，務必減輕教師的授課負擔、削減過於艱深繁重的課程，加強學生輔導工作和密切師生關係。家長應重視教育和家校聯繫，盡一切可能接觸自己的子女，如能在學生的長假期(例如暑期、聖誕假期)與子女同歡共樂或出外旅遊，更可收親子之效。

青少年輕生事件是對青少年工作缺陷的一種懲罰。警鐘敲響了！現在該是社會甦醒的時候。幫幫孩子，讓他們發出青春的火花，熱愛生活，享受人性的真善美，無疑是長輩的天職。

穆迪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偏見透支其公信力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3月2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內地的政府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3月12日，穆迪又調低香港的主權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

新華社3月3日撰文指出，穆迪的這份報告帶有雙重標準，即對中國「苛刻」，對美國「放鬆」，穆迪的做法只會透支其公信力、影響力，令其有關指標前瞻世界經濟的權威性大打折扣。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3月12日回應指出：「我覺得他（穆迪）是錯誤評估了，他對香港和中國內地，我們是有一個密切的關係，但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個『中國風險』，但其實這應該是一個『中國機會』。」

穆迪長期奉行雙重標準

穆迪在下調中國內地評級的理由中，指中國改革不確定性、中國政府債務水準上升和外匯儲備減少。但這些都表明穆迪對中國改革進程的評估出現了偏差。今年以來，全球經濟都籠罩在不確定下，急需在結構性改革中尋找出路。相比起來，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是主動求變，積極調整，長期來看降低而非增加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而且，從絕對水準來看，中國依舊保持着全球領先的經濟增速、健康的財政赤字、充沛的外匯儲備和較高的利率水準。

穆迪長期幹着損害自己信用和操守的事，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的主權債務評級奉行雙重標準。比如，美國的次貸危機誘發了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但穆迪依然給予美國主權債務評級最高級別。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赤字佔GDP的比例，遠高於國際公認的3%的警戒線，但穆迪給予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的最高地位仍然不變。更惡劣的是，穆迪不去提醒關注安然公司和其他美國公司的造假行為，有欺騙投資者之嫌，因此屢遭「不公正」等譴責。

看中國的經濟，不能再用以往的視角看，應該用經濟進入新常態這個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經濟，中國經濟新常態概括：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精闢地指出，中國經濟「四個沒有變」：經濟持續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徵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穆迪將香港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聲稱今次下調決定與中國內地有莫大關係，因中國內地與香港政治聯繫緊密，近年中國內地不斷干預香港事務，在「一國兩制」的緊張局勢之下，無論短期及長遠而言，均會對香港帶來潛在負面影響云云。對此，特區政府發言人反駁說：「穆迪關於內地干預香港的政策制訂和落實，以及因與內地政治連繫而產生政治風險的意見，純屬猜測和主觀陳述，缺乏理據支持。」

「中國風險」對香港其實是「中國機會」

穆迪提及的所謂「中國風險」，對香港來說其實是「中國機會」。「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戰略，將「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意味着香港有更多的「近水樓台」的機遇。「香港所長」恰恰是香港擁有獨特的「一國兩制」優勢，可見穆迪對香港的評估錯得離譜。

穆迪與國際金融大鱷在業務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近年來國際大鱷做空中國內地和狙擊香港的嘗試從未間斷，穆迪受其驅使降低對中國內地和香港評級，是自損公信力的做法。此外，當前大國博弈漸趨複雜，美國評級機構商業行為「政治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通過評級機構影響唱淡中國內地和香港，已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徑。但是，穆迪降低中國內地和香港評級的做法，只會透支其公信力和影響力。

香港發展與內地密不可分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內地學者看香港 OBSERVATION

香港立法會財委會表決通過196億港元高鐵追加撥款，標誌着香港將繼續修建連接內地的高鐵。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許多記者提出疑問，香港是否會被邊緣化。這次撥款通過，一定程度上說明，香港主流民意真切認識到，香港的發展與內地的發展密不可分，香港不會被邊緣化。

香港在內地發展不同時期扮演不同角色。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是內地對外貿易的窗口，是支持內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大批香港企業到內地投資，促進了內地經濟發展，也為香港企業發展壯大提供非常好的機會。

如今，內地經濟發展走上正規化的道路，無論資本市場、傳統製造業市場都面臨非常激烈的競爭，在這個過程中有些香港投資者競爭失敗是正常的事情。假如香港投資者沒有看到內地經濟發展的形勢，沒有看到香港經濟轉型的迫切性，那麼，就可能會加速被淘汰。

中央多次提醒香港，必須盡快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經濟轉型，提高競爭力。特區政府已經確立了香港未來發展的戰略方向，為香港經濟的發展制定了藍圖。但是，正如香港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臨一系列掣肘，一些反對派為反而反，逢中必反，在立法會拉布狙擊施政，香港少數不良少年搞街頭暴力抗爭，都極大地影響了香港的穩定，妨礙了香港的發展。

特區政府審時度勢，通過強化自己的管治能力，為經濟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香港有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他們能捕捉瞬息萬變的商業機會，能在非常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找到突破口。相信在香港特區政府和企業家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一定能夠擺脫困境，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

香港是開放型的市場經濟，香港經濟的發展固然與內地有密切聯繫，但是，香港也要充分意識到，香港必須面向海外，充分發揮自己的傳統優勢，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香港必須學會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充分利用與內地密切聯繫的巨大優勢，巧借東風，鞏固自己的優勢；另一方面面向東南亞乃至整個世界，在世界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香港曾經是貨運中心，隨着內地港口的迅速崛起，香港必須尋找新的貨源；香港至今仍是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今後香港必須充分依靠內地鞏固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積極與其他的金融中心合作，從而使香港繼續扮演好金融中心的角色；香港是國際旅遊中心，今後除了提高服務質量，為內地遊客提供更好服務之外，還應該面向海外，積極扮演橋樑的角色，讓更多的外國遊客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實現內地和香港雙贏。

香港的經濟總量雖在國家所佔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香港的經濟基礎良好，擁有大批優秀人才，只要香港創新轉型，一定能走出新天地。

未來香港還可以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出版中心，可以成為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可以成為中國科技創新中心，只要香港充分利用自己的科學教育優勢，不斷推陳出新，香港一定能創造奇跡。